

大上海小说丛书
DASHANGHAI XIAOSHUO CONGSHU

汽车城

i C h e C h e n g

殷慧芬

QicheCheng



上海文艺出版社

汽车城

殷慧芬

Qiche Cheng

风雨十年汽车城
悲欢几代汽车人

Q i C h e C h e n g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汽车城/殷慧芬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9

(大上海小说丛书)

ISBN 7-5321-1989-0

I.汽… II.殷…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1086 号

责任编辑:左 泥

封面设计:王志伟

汽 车 城

殷慧芬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字数 308,000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2 版

200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8,100 册

ISBN 7-5321-1989-0/I·1616 定价:22.00 元

“大上海小说丛书”编委会

主 编：徐俊西 孙 颢

副主编：叶 辛 江曾培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荣 毛时安 叶 辛 江曾培 孙 颢

李小林 陈保平 宗福先 郑宗培 金福安

赵长天 徐中玉 徐俊西

编辑说明

“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反映以上海为主的都市题材,表现当代上海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的宏伟业绩及其生活、情感、命运、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变化的比较优秀的小说作品,展示世纪之交时期的小说创作实绩。

“大上海小说丛书”以长篇小说为主,计划每年出版一辑,每辑五种。

“大上海小说丛书”设编辑委员会。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6年8月

“大上海小说丛书”总序

徐俊西

文学创作中经常面临着这样两个反复出现的问题,即一个是文艺功能的问题,一个是怎样实现这些功能的问题。

新时期以来,在激荡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日新月异的文艺思潮面前,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也引发了一场空前活跃的探索 and 实验——从原始寻根到现代超越,从反映现实到表现自我,从功利主义到唯美主义,从形式结构到内容消解,从意识流到黑箱工程……短短十来年的时间,几乎让人们体验和见识了本世纪文艺史上所有的主要思潮和流变。而正是在这种纷纭繁复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中,人们对于文艺的功能问题有了更多的新的体验和思考:一方面对于审美形态的多样性和多元互补的审美效应表现了应有的理解和宽容,一方面对于某些文学主张的偏颇和文艺功能的丧失感到关切,并希望以往文学创作中密切关心社会、关注人生的现实

主义传统能够得到继承和进一步发扬。正是有鉴于此,便有了我们这套“大上海小说丛书”的策划和创作。

顾名思义,“大上海小说丛书”是以反映上海的生活题材——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为主要的艺术追求和价值取向的。我们希望通过当代中国这一奇迹般发展腾飞的国际大都市生活面貌的艺术展现,能够生动折射出现代社会的时代精神,表现上海人民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要求。

然而我们知道,生活题材本身的意义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因为文学创作虚拟性和典型化的特点,使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已不是直接的、单向性的客观真实,而是作家艺术家的主观体验和客观现实双向建构的“虚的实体”。这种“实体”在某种意义说,已经失去了给人们直接对应和效法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品格。正因为这样,文学与生活之间的认知关系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审美过程,需要有关文学的专门知识来加以理解和阐述。

一般说来,人们在进行文学阅读时,所注重的并不是作品中人物事件的表面的模仿价值和实用意义,而是通过这些人物命运和事件所显示出来的生活意味和情感形式。这样,尽管读者明明知道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大多都是“纯属虚构”的,但只要这些意味和形式能够启迪人生,引发共鸣,就能产生一定的审美效应。而作品中揭示的生活意味越深刻隽永、新颖锐智和富有人生况味,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作用就越大;所展现的情感形式越能够陶冶性情,净化心灵,并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作品的欣赏价值和艺术品位就越高。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们在深入当前的现

实生活,努力感受和捕捉新鲜生动的生活形式的同时,还必须注重提高自己对生活的洞察力和想象力,加强自身的人格力量,因为“除非自己站得比别人更高,才能领悟到别人所没有领悟的生活真谛;除非自身灵魂是美的,否则便看不到美。”

最后,不言而喻,文学作品的任何价值和意义都必须通过大众阅读才能实现,所以雅俗共赏便成了我们这套丛书刻意追求的审美特征。即既要有较高的文学性和艺术品位,又要有大众文化和畅销书的欣赏趣味和特点——故事性强,叙事方式和语言生动晓畅,有为大众所关心熟悉的人物命运、社会热点,并能符合和满足普通人的欣赏习惯和生活愿望等等。当然,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还不容忽视当下时兴的、有效的各种宣传促销手段和现代化的传媒方式,包括文学和影视创作的相互转换和相得益彰的操作方法。

总之,期盼我们的这套小说丛书能够成为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一个花絮。

1996年8月18日

序

江曾培

工业题材文学的新成就

工业题材的作品,在我国文学创作中,一直是个薄弱的环节。即使像上海这样一座工业大城市,写工业作品的作者也比较少。五六十年代,上海出现过一批工人作家,他们的作品,集中反映了工业战线的生活与斗争,展现了产业工人的生态与心态,拓展了文学表现的领域,给文坛带来一股新鲜气息,引起社会广泛注意,成为当时文坛的一种“新生事物”。然而,尽管这些作品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并没有出现特别重要的力作。在文学的总格局中,有份量的作品,多为农村题材与革命历史题材,如现在人们还经常提到的“三红一创”,即《红旗谱》《红岩》《红日》和《创业史》。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作家以多元的审美方式反映生活,作品的题材与

风格,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局面,文学园地万紫千红,繁花似锦。但是,这当中,工业题材的作品也仍然显得薄弱。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蒋子龙在他一系列的作品中,塑造了工业战线上的“开拓者家族”。不过,呼应者与后继者不多。较之大量反映农业改革,展现农村生活的作品来说,还是势单力薄。许多作者,包括新时期文坛上特别活跃的“五七”作家与知青作家,他们的作品,或多或少、或重或轻都与农村生活有着瓜葛,而很少涉及工业领域。

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较多较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我国以农立国,农村的状况如何,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成败。我们的作家与农村的关系历来比较密切,不要说那些出生于老革命根据地或在老解放区生活过的作家,就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几代作家,大多也以不同方式在农村生活过,或蹲点,或插队,或“流放”,或“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作家们对农村比较熟悉,农村生活成为哺育他们的一块丰腴土壤。相对说来,在工厂生活过的作家就比较少,他们大多对工业比较陌生。同时,农村对创作来说,也确是汲取诗情的“广阔的天地”。浓郁的民俗民风,紧密的人际交往,美好的自然景色,都较之工厂更能入诗入画。写工业,有所谓“车间文学”的枯燥,写农业,则尽得“田园文学”的韵致。所有这些,都使得农业题材的文学较之工业题材的文学发达。

然而,时代的发展,需要我们改变工业题材文学薄弱的现象,加强这方面的创作。应该说,题材只是文学反映生活范围的一种类别划分,并不决定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作品不论是写工业题材、农业题材或其他什么题材,都不是为了去具体诠释某个行业,而都是为了写人,写人性、人情、人欲,通过生

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去影响人们的思想感情从而影响社会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题材只是文学创作的一种载体。过份强调它是不必要的。但这不等于说,题材可以不加考虑。由于题材出自生活,不同的题材对于作品内容的表达是有着不同意义的。所以,鲁迅强调“选材要严”。就整个文学格局来说,现在所以要特别重视一下工业题材的创作,一方面,是由于它本来比较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国,正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它所引起的生产关系、管理方式以及人们价值观念、生活习性的变革,最具冲击力。深入精当地表现这方面的生活,无疑最有利于展示我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展示我们社会生动活泼的主潮,展示各阶层人们的命运、精神、心理在社会变革中的升沉起伏。工业题材可以说是反映当前变革生活的一个聚焦点,理应得到更多作家的关注。

默默地在这方面积蓄力量的作家是有的。殷慧芬就是一位。她是个“老三届”,1968年中学毕业后到工厂当工人,八十年代就开始创作,应该说也是个知青作家。然而,当年知青的主流是上山下乡,以至后来的知青文学也特指那些写农村的作品,未能容纳留城进厂的知青作品。这固然由于留城进厂的知青是少数,反映工厂知青生活的作品更少,引不起社会的关注;同时,不能不说也与对工业题材的作品存在某种程度的忽视有关。因而,尽管殷慧芬勤奋地在写,从多个角度表现了“文革”中留城进厂的知青生活,表现了进厂知青周围的人与事,写得有声有色,精彩跃动。按茹志鹃1993年在给她第一部小说集《欲望的舞蹈》作“序”中所说,殷慧芬“突破了车间文学,也突破了以前写工人的文学”,但似乎并未得到应有的

“重视与扶植”。好在殷慧芬宠辱不惊,我行我素,坚持在工业领域里耕耘。现在,她以多年的积累,奉献出长篇小说《汽车城》,超越了原有对工厂知青生活的描绘,以细腻的笔墨和雄伟的气势,展现了上海汽车工业的艰难起飞,以新的文化理念,描述了人性、人情、人欲在工业发展中的冲撞,传递了我国社会变革的最新信息,塑造了众多富有时代气息和鲜明个性的人物,为我国当代文学增添了一页新篇章。它既是作者创作的一个新突破,也是我国工业文学的一个新提升。《汽车城》裹挟着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学创作的双重成就,向伟大祖国五十周年致意。

引起惊喜的新文化理念

《汽车城》写的是上海一家中德合资的轿车工厂——俊友汽车公司,于1987年至1995年期间,在建厂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错综复杂,有中方与德方的矛盾,有厂方与上级乃至中央领导部门的矛盾,有合营企业与其他企业的矛盾,有主厂与配件厂的矛盾,有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有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的矛盾,有利益上的矛盾,有认识上的矛盾,有生产上的矛盾,有经营上的矛盾,有制度上的矛盾,有方法上的矛盾……作品所表现的,就是这些矛盾的发生、发展、解决,再发生、再发展、再解决的过程。常言说得好,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大的矛盾,恐怕也不会有精彩的世界。有些人喜欢搞无冲突论,作品或水波不兴,或杯水风波,这自然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文学的大树,特别是好的长篇小说,在无冲突的土壤中是肯定长不起来的。《汽车城》正是没有回避尖锐

复杂的矛盾,显得有声有色,撼人心魄。尽管其中的许多矛盾互相纠缠,“剪不断,理还乱”,以至有时给人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感觉,作者依靠对生活的熟悉,有胆有识——化解了这些矛盾,终于把作品领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成功地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汽车城”。

作者的胆,在于勇于面对矛盾,立在生活中的根基较深。

作者的识,在于善于分析矛盾,站的思想视点较高。

这个视点,就是在作品中以一种新的文化理念来审度一切。

比如,如何看待我国轿车工业的发展,开始也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我国应重点发展生产用的卡车,不宜搞轿车这样的资本主义消费品。“现在大城市中的无产阶级道路都让资本主义轿车占了,而且一不小心,无产阶级就被资产阶级轿车撞死”。这自然是“左视眼”的看法,但说服它也有个过程。作品没有就事论事,而是把轿车工业放在整个国民经济调整的格局中来考察,显示了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出现,符合人民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历史的必然。

更引起议论的,是与德国人合营制造飞云牌轿车。老工人潘荣根,对他成为俊友汽车公司总经理的儿子潘树德说:“这个俊友的飞云车,我看是卖国车。三十年前我们就有自己的浦江牌了,想办法把浦江牌搞好么。你当心以后有人算账,骂你是卖国主义。”与外资合营企业,到底是卖国主义,还是爱国主义,这一论争现在似乎已经清楚了,但当时确是飞云牌轿车上马的一个重要思想阻力。特别是合营过程中,由于对质量的要求不一致,德国人坚持他们的高要求,以致有些人,认为这样“让德国人说了算”,有损我们民族尊严。怎样看待这

一问题？作品通过当时的总经理郭大林说了这样一段话：“搞轿车，我们还是小学生。我们要搞世界公认的水平，就是要德国人说了算。然后才有中国人说了算的资格。”在自己技术不行的情况下，这种先做学生，后做先生的做法，是真正维护民族尊严。尊严，不是空洞的去争一个虚荣面子，而是要化为自强不息的动力。

自强的结果，就会很快成为先生，不再只“让德国人说了算”。俊友公司中的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了自己奋发图强的志气。后来，在一项基础工程中，后任总经理潘树德集中大家智慧，利用熟悉上海的有利条件，否定了德方提出的方案，提出了自己的“上海方案”，尽管德方开始寸步不让，但由于“上海方案”确实先进，德方最后也不得不接受。民族自尊，表现在面对强手，该说“不”的时候，也要勇敢地说“不”。

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中德合营的俊友公司壮大了，意欲进一步兼并原来的浦江厂。这又引起一场思想交锋。有些人认为，飞云牌“吃”掉浦江牌，就是德国人“吃”掉上海人，这样还要不要民族工业？这自然又是一个大问题。问题是民族工业的内涵在发展，在变化。那些由民族资本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也属民族工业之列。飞云牌“吃”掉浦江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外国工业吞掉了民族工业。然而，这道理要说服像潘荣根这些把美好年华都献给了浦江厂的人们，是很难的，他们“死也要保住浦江车”！这就是原有感情与新现实新理念的矛盾。作品并没有简单地以理斥情，而是体察其情，晓之以理，将可贵的民族感情从狭隘的理性束缚中，引导到开放务实的河流中去。

还有，中德合资，双方既存在利益的矛盾，同时也有利益

一致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同大于异。否则,就不会走到一块来。比如,在加速飞云零部件国产化问题上,按一般想象,总以为只有中方积极,德方是消极乃至抵触的。实际上,德方不比中方少着急。因为,飞云零部件的利润是有限的,长期依靠德国进口,会限制飞云车的发展,倘能迅速实现国产化,飞云车的产量就会猛增,大大扩充它在中国汽车市场上的占有率。这才是德国人看重的地方。所以,德国人施盖纳说:“在国产化问题上,我们同中国伙伴是同心同德、利益与共的。”应该说,这是真心话。就是这个施盖纳,也衷诚希望中国人在俊友公司中多出自己的人才。因为,“上海俊友要有永久的生命力,就应该是中德两种文化的结合,而不应该仅仅是德国的翻版”。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国际企业家的胸襟。高科技的发展,使全球走向经济一体化。用全球意识审时度势,方能高屋建瓴。这也是《汽车城》中流动的新文化理念。

文学是要以形象表现生活的。思想、理性、倾向,都要寓于形象之中。按恩格斯的说法,就是作品中的倾向,都要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上面抽取的一些思想、理性,应该说都是从《汽车城》的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这是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所在。文学要讲形象,但不可忽视思想。没有思想的形象是苍白的。阿·托尔斯泰说:“艺术——这是思想引起的喜悦。”《汽车城》在展示新时期生活的矛盾斗争中,与僵化狭隘的观念揖别,流淌着一种新思想新理性,如关于维护民族自尊问题,关于开放、务实问题,关于全球意识问题,以及在一切方面都贯串着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问题,以其新鲜性、尖锐性,给人以惊喜。《汽车城》也因此显示它鲜明的时代特色。

人物形象的悲剧色彩

小说的基本审美对象是人。小说需要活生生的人物，长篇小说更是如此。《汽车城》这座“城”，归根到底是靠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支撑的。俊友公司前后两任总经理郭大林、潘树德，郭大林的妻子樊玉绣，儿子文彬、文翰，潘树德的父亲潘荣根，妻子汉梅，早年恋人肖菊妹，儿子欣荣，女儿欣华、欣明，老干部万辅成、金鑫，变速器厂厂长杭天飞，高干子弟张南方，记者张小章，以及德方副总经理卡尔，质量总监斯泰尔等，都栩栩如生，给人留下印象。其中特别成功的，像郭大林、潘树德、杭天飞这些典型形象，出色地丰富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文学画廊，作品的思想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主要从这些艺术形象中喷发出来的。

潘树德等这些人物形象，都是些“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他们身上有着改革开放年代人们的许多共性。说“陌生”，则是他们身上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在殷慧芳的笔下，这些人物身上又都笼罩着一层悲剧色彩。郭大林，出身名门的汽车专家，作为首任总经理，对俊友的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尽管他宵衣旰食，殚思极虑，但夹在中德双方之中，好多事情处于上下左右不讨好的局面，以至不时蒙发归隐林下之思。然而，林下未及归隐，不堪重负的各种矛盾，加以儿子出国逾期不归，爱妻身患绝症，使他猝然倒在德国举行的董事会会场上。潘树德，较郭大林精明强干，在各种矛盾中周旋自如，左右逢源。作为继任的总经理，有效地将俊友事业推向了前进。但是，尽管他事业上一帆风顺，个人生活上却有着诸多

的不如意。对早年恋人菊妹的始乱终弃,使他长期受着良心责备。妻子汉梅与他貌合神离,最后离他而去。一个女儿自杀,一个儿子出走。“他这部成功的战车无奈地碾碎了他自己的生活”。杭天飞是位“女强人”,事业上有成,但“连儿子的心都留不住”。在公众面前,风风火火,坚强自信,私下里,却流着泪无声地舔吸着自己的伤口。

郭大林、潘树德、杭天飞们,都是好人,正面人物,甚至都可以称为英雄人物。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是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功臣。人们通常不会把他们和悲剧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具有悲剧性质的人物,恰恰都是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伟大的、先进的、善良的正面素质。因为,只有拥有正面素质的人,他们的不幸与磨难,方能引起人们的悲哀与同情。倘若一个人丝毫没有正面素质,他的命运虽是不幸的,也不能成为悲剧人物,而往往是喜剧性的。所以鲁迅说“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殷慧芬自踏上文坛开始,她笔下的人物,都是具有正面素质的好人。这表明殷慧芬以她善良、温馨的心灵在观察社会,观察人生。世界上总是好人占多数。特别是在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的社会主义今天,人性的美好方面更日益得到张扬。同时,殷慧芬又总是给她的人物或多或少的染上一些悲剧色彩。像过去写的,《厂医梅芳》中的梅芳,《迷巷》中的茹菲,《欲望的舞蹈》中的惠子等,生活中和心灵中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磨难。不过,这些人物多是工厂中的青年女工,多是弱小人物;如今《汽车城》中的潘树德们,则多是强者,多是握有一定权力的男女,殷慧芬仍然给他们以悲剧色彩,则又反映作者对社会、对人生观察的清醒与深邃。